

漢陽文史資料

第一輯



政协武汉市汉阳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前 言

文史资料工作是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民政协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它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通过组织各界人士撰写“亲闻、亲历、亲见”的史料，不仅丰富了历史研究工作的资料库，而且可以为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提供历史知识和乡土教材，使他们从中受到启发教育，增强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汉阳区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于八五年七月成立以后，就着手开展了征集工作。一年来，在中共汉阳区委的热情关怀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收到了四十余篇稿件。为了扩大影响，进一步作好文史工作，我们根据周恩来同志对文史资料工作指出的“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的指示精神，从中选出了部份稿件，编为《汉阳文史资料》第一辑。这本书的出版一方面标志着我区文史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期望能给那些可以提供这方面史料的同志一个启示作用，为下一步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

汉阳区是武汉市的六个中心城区之一，位于武汉市西南，滨临长江，依傍汉水。它与夹江对峙之武昌，隔河呼应之汉口一起组成武汉三镇。境内的地形地貌别具一格，奇妙的三山五湖遥相呼应，把全区装扮得如诗如画。历代的诗人墨客在游览汉阳以后，都要留下赞美的诗句。汉阳既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区，又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据史料

记载，汉阳形成市镇的历史，至今已有一千七百余年，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使汉阳留下了许多名胜古迹，动人传说。远的不说，近代史上太平天国革命武装在龟蛇两山之间架设浮桥以汉阳为据点进攻武昌；辛亥革命中黄兴设指挥部于古琴台指挥革命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阳夏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向警予烈士等党的优秀儿女的忠骨就掩埋在汉阳龟山南麓；著名的“汉阳造”步枪在“工业救国”口号下，应运而生，更是在全国闻名遐迩……我们开展文史资料工作，就是要本着拾遗补缺的精神，让那些尚健在的历史亲身经历者把他们所看到的、听到的和知道的各种史料记录下来，让它为当前的两个“文明”建设和统一祖国的大业服务，并使之惠及子孙后代。

编辑的内容，注意体现了文史资料的多样性，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希望读者看了本资料以后，能受到一些启发，也来动手撰稿，与我们一道共同作好文史资料工作。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项工作刚刚起步，我们没有什么经验，加之编辑水平有限，所以当本资料出现在读者面前时，疏漏以至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还望读者斧正。

汉阳区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八月

目 录

前 言	1
-----	---

回 忆 篇

汉阳解放前后记实	朱宝贤 曾卫(1)
回忆与周总理一次终身难忘的会见	李峻鸣(7)
忆中原突围前和陈少敏同志的一次会见	左德星(11)
请李书城先生演讲	余开来(15)
日寇轰炸汉阳罪行录	曾卫(22)

首 义 篇

辛亥英烈血洒汉阳大地	程振坤(25)
吊汉阳古战场	谢珈航(34)

沿 革 篇

汉阳今昔	陈绍精(39)
汉阳古城史话	艾政宽(44)
汉阳地名四则	肖智斌(53)
钟家村的兴起	曾金阶(56)
集稼嘴的崩坡	曾金阶(58)

新 貌 篇

武汉长江大桥建设杂忆(一)(二)	唐襄澄(60)
龟山电视塔	李 藩(68)
晴川名胜换新颜	杨忠平(71)
汉阳新貌动乡情	许婉如(77)

文 教 篇

- 建国前汉阳的两所教会中学.....杨子名(81)
我所知道的训女中学.....陶瑞芳(85)
印度访问记.....昌 明(92)
古城灯会,璀璨夺目.....王焕彩(98)

工 商 篇

- 汉阳铁厂风云录.....高弼臣(103)
鹦鹉洲的竹木市场.....骆加得(107)
武汉油脂化学厂今昔谈.....姚玉林(117)
汉阳老锦春酱园.....骆加得 郝介民(122)

名 胜 文 物 篇

- 晴川历历汉阳树.....余开来(129)
芳草萋萋鹦鹉洲.....余开来(136)
汉阳名胜趣谈.....艾政宽(147).
鲁肃墓.....杨业汛(155)
洗马口.....杨业汛(157)
汉阳铁厂的一块高炉残铁.....杨业汛(158)
大别山摩岩的考证.....杨业汛(160)

人 物 篇

- 回忆骨伤科名医李荣山.....梅竹青(162)
武林豪杰李国操.....刘仲翼(169)
一份幸存的汉阳区地籍图.....曾金阶(173)
后 记.....(175)

汉阳解放前后纪实

朱宝贤 曹 卫

解放前的汉阳区属湖北省汉阳县治，也是伪汉阳县政府的所在地。一九四九年初，当时这里分设大别、琴台、鹦鹉三个镇，辖三十四个保（其中大别十四个、琴台十三个、鹦鹉七个），人口有七万四千四百七十七人。

伪县政府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一是强制推行保、甲制度。以十户为一甲，设甲长一人；六——十甲为一保，设保长一人，保丁、书记若干人；十保编为一个联保处，设联保主任一人，由伪镇公所管辖。除个别地方的甲长由居民推选或轮流担任外，绝大多数的伪保、甲长由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充当。同时，伪湖北省警察局在汉阳城区又设了四个分局（即九分局、十分局、十一分局、十二分局）。十一、十二分局各下辖一个派出所。反动统治者不顾人民的死活，肆意抽丁、派粮、派款，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反动的县政府内部派系盘根错节，最主要的派系有以“省参议副议长”艾毓英为首的“永安系”，有以“国大代表”陈化平为首的“边江系”，有以“汉阳县县长”扬干为首的“县训系”，有以“原国民党军官”严新传（汉阳县银

行董事)为首的“在乡军官会”。这些派系之间互相倾轧，互相利用，尔虞我诈，更是加深了人民的痛苦。

为了领导汉阳人民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迎接大军解放武汉，在地下的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下，一九四九年二月，成立了以周麟同志为书记的中共汉阳县委，以彭怀堂同志为县长的汉阳县政府，随即派城工人员打入伪县政府和镇公所，争取进步人士，控制武装，迎接解放。在我党政策感召和城工人员的争取下，一九四九年五月二日，汉阳城区进步人士组织成立了武汉治安维持会汉阳分会，根据其工作重心开展了与人民有益的工作，进而控制了伪警察十分局六十名枪警及琴台、鹦鹉枪警二十名，并将全县公校产图册及地籍图转移到安全地点，使各学校文卷、财产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为解放汉阳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四月二十三日，百万雄师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覆亡。五月，我解放大军逼近武汉。十五日下午六时许，盘踞在汉阳地区的国民党伪县政府、伪县训所、伪县党部、伪三青团的反动分子仓惶逃窜。十六日凌晨三时许，国民党驻汉阳地区的伪守备队、伪警察局、伪自卫队的反动分子也相继逃窜，伪县政权彻底瓦解。武汉治安维持会汉阳分会当即在其会员夏世鉴家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各项临时措施。会后，发动消防人员一千五百名维持社会治安，并汇同十分局，以及鹦鹉、琴台两镇枪警到处梭巡，随时准备打击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犯罪活动。

十六日上午，武汉治安维持会汉阳分会又召开汉阳城区有关人士会议，宣布成立汉阳临时救济委员会，推举张忠

襄、樊树分、袁德九、陈锦堃、杜少丞、何席之、张忠铠、邓鹤卿、宋继贤、李启东、金后仲等十一人为委员。并由张忠铠负责总务，陈锦堃负责防护，张忠铠负责治安，邓鹤卿负责财政，金后仲负责联络，夏世鉴担任秘书，以县银行作为办公地点，新成立的汉阳临时救济委员会负责维持汉阳城区的局面，准备迎接解放军进城。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日，在云梦待命的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江汉军区独立一旅接到江汉军区解放汉阳的作战命令，十六日，独立一旅一万多名指战员在旅长李人林，政委齐勇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向汉阳挺进。十七日中午，独立一旅尚在进军途中。汉阳城区秩序比较混乱，一些国民党部队溃散下来的散兵游勇进入城区进行骚扰或诈称解放军进行敲诈。汉阳临时救济委员会局面难以维持，委派汉阳简师教员杨春亭（现武汉三中退休教师）赶到汉口，经向四野先遣兵团一一八师李伯秋政委接洽，遂派一连解放军指战员在杨春亭的引导下，从汉口集稼嘴坐划子进入汉阳城区。未几，独立一旅以一团为前卫，二团居中，旅直随二团后跟进，三团为后卫，浩浩荡荡开进汉阳城。此时，汉阳城区市民倾城出动，热烈欢迎解放军进城。口号声、锣鼓声、鞭炮声汇成了欢腾排空的激流，人们为翻身解放而雀跃欢呼。

同日，江汉独立一旅奉命组织警备部队，旅长李人林任警备司令，当即开展了警备工作。并颁布布告，重申必须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买卖公平，一切缴获归公，保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的财产，严防奸细破坏。汉阳城区秩序迅速恢复了正常，商店继续营业，工厂照常开工。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武汉市成立了以谭政为主

任，陶铸为副主任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开始对汉口、武昌、汉阳城区部分（今汉阳区）实行军事管制。至此，汉阳城区部分正式由武汉市直接管辖。五月二十八日，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谭政、副主任陶铸签发命令，任命郑铎同志为汉阳军管小组组长，随即率领一批干部进入汉阳。一面对汉阳实行军事管制，一面着手接管伪警察局的准备工作。六月十五日，军管小组召开了伪湖北省警察局九、十、十一、十二分局全体人员会议，郑铎同志宣读了武汉市公安总局关于接收国民党旧警察机关命令，同时宣布对汉阳地区旧警察机关予以废除、解散。

由于汉阳地处偏僻，情况比较复杂。解放初期，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甚多，加之地方上的反动残余势力，他们不甘心失败，有的造谣生事，张贴反动标语，暗中打黑枪，刺杀我接收人员，有的甚至公开抢劫、放火，进行破坏。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保卫胜利成果，新成立的以郑铎为局长，曹荣斋为副局长的武汉市公安总局汉阳分局，对一些民愤大，罪行严重的汉奸特务坚决地进行了镇压。同时，深入群众宣传我党的城市政策和我军的纪律、宗旨。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初步稳定了社会秩序。

为了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型人民政权。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派遣李祁年同志率领一批干部进入汉阳，组建了以李祁年为区长、吴明勋为副区长的武汉市汉阳中心区政府。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开始对伪县政权进行接收。主要工作是：取消伪组织，建立人民政权；收回清查被敌伪破坏、隐蔽的印信、档案、图册、物质等；留用少数旧职人员以便接收工作的顺利进行。在汉阳中心区政府

的领导下，成立了以吕明轩为组长的大别工作组；以尹志强为组长的琴台工作组；以徐守政为组长的鸚鵡工作组。六月九日，上述三个工作组，分别对原国民党伪大别、琴台、鸚鵡三个镇公所进行了接收。不久，武汉市人民政府委派卢寿彰同志任汉阳中心区福城（城郊部分）工作组组长。卢寿彰同志持武汉市人民政府市长吴德峰、副市长周季方的亲笔信，经与汉阳县政府县长彭怀堂同志接洽，正式接收了福城乡。在接收过程中，汉阳中心区政府及大别、琴台、鸚鵡、福城工作组先后召开了区、镇群众大会，责令旧镇、保、甲长向人民认过。同时号召群众检举国特，检举隐蔽的物质和武器弹药。还召开了进步群众、资产阶级中的开明分子会议，听取他们对伪组织机构的意见和对旧职人员的批判。接着在人民群众中广泛进行宣传，解释政策，调动群众搞好生产建设的积极性。

通过接收工作，汉阳中心区政府在原有四个工作组的基础上，组织建立了大别、琴台、鸚鵡、福城等四个区政府。由于四个区政府刚刚建立，当时还要利用和管理旧保、甲人员进行工作。采取的方法是：一、要保甲人员汇报一天所做的工作和群众中发生的问题；二、保、甲人员有调查检举权，无处理权；三、如知道各保、甲有隐藏的敌伪物质及匪特情况不报告者，应受严格处分；四、在群众中宣传旧保、甲如何压迫群众。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汉阳中心区政府接到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季方同志关于废除旧保、甲制度的指示后，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废除旧保、甲制的工作。同时，在居民群众中开展了热火朝天的选举居民代表和

居民小组长的工作。开始建立了新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作者简介：朱宝贤 男 55岁 区委党史办公室副主任
曾 卫 男 31岁 区委党史办公室工作人员

回忆与周总理一次终身难忘的会见

李峻鸣

在我生命的长河中，经历过许多的事情，但只有一件事使我终身难忘，那就是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一次幸福的会见。那次会见所产生的力量直到今天还在激励着我。

那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广大群众日以继夜忘我劳动，那种场面激动着每个人的心。当时，我在市立一医院工作，是一个年青的妇产科医师，同样是劲头十足，不知疲倦的工作。那年，我所在的一医院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以大带小，和湖北省应城县卫生院挂了钩。我首先响应，积极报名到应城县去工作。

应城县是一个老革命根据地，湖泊遍布东南县境。战争年代，无数先烈在这片土地上洒下了鲜血。当时这个县的湖泊出盐，另有一个旧社会留下的石膏矿。县城人口不多，只有一条两人宽的青石板路，没有高大建筑。县卫生院设在一个小院内，是利用原来的教堂，约有二十张病床。医护人员中没有正规的大学毕业生。仅有4、5名中专生和学徒数人，真正能应诊的只有三个人，外科医生、麻醉医生和我，也只能做一般的腹外手术。我的工作重点是负责妇幼保健所。这个所是新盖的平房，设有6张简易病床。所长是一位解放初期作妇女工作的同志，只能作行政管理工作。因为那一年应城县

妇幼保健所工作较好，采用新法接生率高，被评为全国先进单位。

在县医院工作一段时间后，我根据领导安排又和四个助产士到距城五里多的一个村子办产院。这个村较大，约有一百户人家。村头有一条大路，村口用彩旗扎了一个大方门楼，这里是湖北省第一个人民公社，名叫“红旗公社”，每天都有汽车来来往往，各地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我们所在的产院设在村子的东南角的一个农家院落里，两个房间外加一个厅。小院东角处是灶房，门向西北。经过我们五个人的安排，在两个房间内设放了八张病床，产前门诊检查处就设在厅内，随诊产妇住院要自带被褥用品，住院分娩不要钱，还可以供给一斤红糖，二斤鸡蛋。附近还设有敬老院、托儿所和幼儿园。

有一天早上，当我看完病人走出病房时，看见周围的人都在忙着做清洁，一会儿我所在的产院病床上也铺上了白布新床单，病人穿上整洁的衣服。看到这种情况，大家纷纷猜测可能是什么贵宾或首长要来。大约在上午11点钟的时候，远远望着一长排小汽车朝村子开过来，最后停在了牌楼跟前。车门一开，我一眼就看到我们最敬爱的周总理，陪同朝鲜的金日成首相走下汽车，随同的还有张体学省长以及县委书记、记者、摄影师等约三十多人，一起走进村子，首先来到了产院。看着总理那慈祥的笑容，我的心激动得好象要从胸腔里跳出来，连想向总理说的话一时都说不出。看着我紧张的样子，总理就问我：“你是河南人吧？怎么来到这个地方工作呀。”我说：“是河南人，是从医大毕业后分配到湖北来的。”总理亲切的话语，使我的心逐渐平定下来，就向总理

汇报了产院的工作。总理仔细听了我的汇报，还不时提几个问题。不大一会儿，金日成首相和朝鲜劳动党的一位朴委员（女同志）一起走进了产妇病房。周总理同朝鲜客人将病房看了一遍，并检查了一下病床上的铺盖，最后同我们几个医护人员一道合影。临离开产院时，金日成首相给我们五个医护人员每人发了一个奖章。周总理也肯定了我们的成绩，还鼓励我们要好好工作。记者叫我们谈了一下感想，并将我说的话录了音。车队离开村子很远了，我的心还久久不能平静。周总理平易近人的态度，深入实际的作风，使我深受感动。他老人家德高望重，日夜操持党和国家大事，还这样关怀我们医护人员，我这个普通医师怎么能不激动、不发奋呢？我们年青的五位医务人员第二天又共同合影，都表示一定不辜负敬爱的周总理对我们的勉励，要竭尽全力作好我们的工作。

六十年代初期，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省江汉平原农村，出现了干瘦、浮肿、闭经、子宫脱垂等四种多发病，以及胃扩张、肠梗阻等消化道疾病。我积极响应党组织号召，又参加了农村巡回医疗队，先后两次下到应城县农村，在人少任务重的情况下，日以继夜地工作，较好地完成了任务。我所在的队被评为红旗标兵，受到中共湖北省委的表扬。六三年和六四年还到了大悟县和崇阳县培训医务人员，送技术下乡，为农民兄弟治病，受到普遍欢迎。总的说来，在这几年中，我多次参加巡回医疗队，到应城、孝感、崇阳和大悟等县，勤勤恳恳工作，治愈了大量病人，为支援农业生产，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尽到了应尽的责任。这一切都是周总理亲切会见的鼓舞与谆谆教导

的结果。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缅怀周总理的光辉业绩，回忆他老人家对我们医务工作者的亲切关怀，感到这种精神时刻都在激励着我自己。每当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这种精神给了我力量，给了我奋斗的勇气。在十年动乱中，我爱人被迫害致死，我忍着极大的悲痛，照样努力工作。我们医院支援三线建设，我首先到十堰市安排家属，培训山区医生，在山区勤俭起家，为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洒下了辛勤的汗水。七四年以后我调到市五医院妇产科工作。在仅有30张床位和2个医师的情况下，发展到目前拥有100张床位和22个医师，由只能解决一般产科疾病到现在基本能作妇产科手术。近十多年来，我还帮助院内外医师写出了30多篇有临床价值的论文，在市属医院中名列前茅。近三十年来，我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地工作。工作顺利不自满，遇到挫折不悲观，还带出了一批批年轻的妇产科医务人员。这些，都是周总理的亲切教导和他老人家深入实际、以身作则的工作作风所给予我的巨大力量。目前，我是已入花甲之年的人了，于去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使自己又增添了前进的动力。当然，自己离党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现在我虽然年纪大了，身体差了，但是我要铭记总理的教诲，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发展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不懈的努力，为“四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李峻鸣 女 61岁 市五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区政协委员

忆中原突围前和陈少敏同志 的一次会见

左德星

一九四六年六月，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是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六万英雄儿女，在党的英明领导下，为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大量牵制敌人，支援华东、华北、东北解放区作战的战略任务，英勇地打击五倍于我的美式装备的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追击、堵截，艰苦地克服酷暑、严寒与江河山岳险阻，战胜饥饿疲劳，粉碎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制造新的“皖南事变”阴谋的重大胜利，也是中原人民解放军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一曲气壮山河的革命英雄主义凯歌。整整四十年过去了，在中原突围前，陈少敏同志亲自动员我们转移的那一段难忘的经历，却一直铭记在我的心头。

一九四六年年初，我和肖永钧、李明钦、肖秀清等同志从各自的工作岗位，奉命调集到设在宣化店附近的中原军区民主建国大学学习。经过游击战争环境短期工作，以及跟随大部队由路西（京汉铁路）转移到路东的艰苦锻炼，我们从大后方和敌占区到解放区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能够有集中学习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当时能亲自听到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和政治委员郑位三等首长的报告，以及刘子久副校长和李昌教育长等同志的讲课，直接接受党的教育和培养，无不感到是此生莫大的幸福和光荣。在宣化店又亲眼见到八路军三五九旅和豫西支队等老大哥部队威风凛凛的军容，格外令人

振奋。

这时正是停战协定下达不久，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假和平谈判之名，行阴谋备战之实。以第五战区刘峙为主，集结三十余万军队，对我中原军区实行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企图一举将我们消灭掉。正在这个关键时刻，董必武和吴德峰同志代表党中央到边区慰问。当时欢迎亲人的队伍，从宣化店排成很长的行列，直达镇外。气氛热烈，盛况空前。在欢迎大会上，董老和吴老相继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军区政委郑位三同志也讲了话，他们号召大家要百倍地提高警惕，严防敌人制造第二次皖南事变。当时真有“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我们的处境十分险峻。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减轻战斗部队的负担，中原局决定疏散转移非战斗人员。四月份的一天晚上，中原局组织部干部科长李其祥到黄家寨队部，找我们四个人谈话。这次谈话除了再一次地分析当时的形势和我军的处境以外，主要是动员我们经武汉向苏皖边区转移。听到李其祥同志这样一说，顿时引起了我们思想上极大的波动，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响应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号召，从大后方重庆来到鄂豫皖边区参加革命，历尽艰难险阻，胜利地实现了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这时的心情犹如长期流落在外的孩子找到亲娘一样。同时感到我们来边区时间较短，直接接受党的教育时间不长，要我们离开边区，这个决定突如其来，好象让婴儿离开母亲怀抱，感情上确实难以割舍。当时我们都抱有这样一种想法：誓与部队共存亡，跟着部队突围出去，即使牺牲了，也死而无憾。经过李其祥同志和中原局组织部副部长张成台同志先后几次谈话，我们的思想一直不通。最后，李其祥同志